



中评周刊 | 第 106 期目录

专题 | 狭隘民族主义与全球性危机

1. 卞英豪: 将火烧圆明园与巴黎圣母院大火同日而语? 幸灾乐祸是狭隘民族主义 P. 2
2. 梁文道: 为巴黎圣母院大火叫好, 不止狭隘, 而且无知 P. 5
3. 穆吉布·马沙尔: 斯里兰卡的暴力伤痕: 宗派分歧和长期内战 P. 13
4. 肯尼思·罗斯: 民粹主义全球性崛起的危机 P. 18
5. 约翰·朱迪斯: 移民问题是如何一步步刺激欧洲右翼的? P. 27

观点文章

1. 邓聿文: 以政改姿态化解民族主义带给中国的难题 P. 35
2. 孙兴杰: 埃尔多安总拿新西兰枪击案说事, 有何深意? P. 37

随笔散记

1. 陈嘉映: 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输给科学家的? P. 39
2. 石剑峰: 加缪: 文艺的反抗 P. 44

读书

- 毕苑: 不朽的库克——读《弑君者: 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P. 48

审美苑

- 浮生旧梦: 著名音乐家卡拉扬纳粹党员的终生污点 P. 54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P. 60

- 订阅 | 往期下载 P. 62

卞英豪：将火烧圆明园与巴黎圣母院大火同日而语？幸灾乐祸是狭隘民族主义

[卞英豪 纵相新闻记者。本文首发于 2019-04-16 东方网-纵相新闻]



巴黎圣母院大火，哥特式的尖顶倒下了,美丽的玫瑰花窗破碎了,优雅的法国人民流泪了



正当全球惋惜文明瑰宝的消逝，我们却听到了一丝杂音。网络上，有“键盘侠”公然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与巴黎圣母院之火联系在一起。更有甚者，还对燃烧的巴黎圣母院表达出幸灾乐祸，“天道好轮回”等尖酸之辞，声声刺耳。

圆明园和巴黎圣母院皆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复制的奇迹。一场大火烧毁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这点上，人们的惋惜和悲痛都是共通的。向肆虐的大火叫好，对文明的陨落而窃喜，如此举动、这般心理无疑是扭曲的、病态的。

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圆明园的大火，是战火无情的践踏，是侵略者蛮横的破坏，是历史的伤痕。巴黎圣母院的大火，是和平年代的火灾，是消防安全的隐患，是现代文明的遗憾。两者从本质上根本无法画上等号，也丝毫没有可比性。

巴黎圣母院之火的起因是天灾或是人祸，你我尚不得而知。但圆明园的大火毋庸置疑，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人祸”。承载中华文化的圆明园不仅经历了英法联军的烧杀劫掠，同样也经历了同胞兵痞的肆意毁坏、军阀的违法偷运。如今，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那段人类野蛮历史的最好见证。



圆明园被烧毁后，雨果曾坦言，自己的祖国是一个卑劣的“强盗”。如今，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着火了，法国民众抹泪祈祷，我们的键盘侠竟弹冠相庆，俨然无视了大火带来的伤痛，忘记了历史带来的深刻教训。如此行径，与你我曾所深恶痛绝的“强盗”何异？

文化无贵贱，艺术无国界。作为人类共同的语言，每一个文明都值得人们尊敬。无论是圆明园还是巴黎圣母院，它们是各国艺术工匠们的智慧结晶，更是人类共同文化记忆。

刺耳的言论伤害的是中法人民珍视的友谊，狭隘的民族主义伤害的是全人类共同携手创造的文明世界。十二兽首回不了家，我们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尽力去找回它们，而不是在卡西莫多家园被毁的时候落井下石。

你可以铭记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但请不要诅咒巴黎圣母院的那片灰烬。你可以不为巴黎圣母院默哀，但请不要幸灾乐祸。牢记历史，从不代表延续仇恨，更不代表以历史之名发泄个人情绪；精忠报

国，从不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更不是敲着键盘在他人的伤口撒盐。

巴西的博物馆之火带来的文明之殇，尚未愈合。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又让人类文明平添伤痕。惟愿如此悲剧不要上演，人们能够理智相处，尊重历史；珍惜文物，保护文明。🙏

[【返回目录】](#)

梁文道：为巴黎圣母院大火叫好，不止狭隘，而且无知

[**梁文道** 香港传媒人，作家，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本文转载自 2019-04-17 看理想]



巴黎圣母院大火后，教堂内部

图片来源：© LUDOVIC MARIN/AFP/Getty Images

我一度不知道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面对那些因巴黎圣母院大火而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人们。从愤怒到不解，甚至于恐惧，最后只能更倾向——悲哀。

哀于他们没有正常的共情能力，哀于他们被仇恨情绪的轻易裹挟，也哀于他们限于无知和狭隘的盲目狂欢。

对于文明的尊重，对于任何文化遗产损失的惋惜或悲伤，是一种人类共通的认知和情感。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情感和认知，我们才可能避免更多野蛮。

分享《新京报评论》评述文章里的一句话：“我们以怎样的态度看待文明的陨落，也反映出我们自身的文明程度”。

来源 | 看理想《八分》（文字经编辑整理）

巴黎圣母院着火之后，有一些国内的朋友就开始讨论：这是不是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报应？那真是“天道好轮回”，于是他们纷纷为巴黎圣母院着火拍手叫好。

部分网友留言

尽管今天我们国家几乎在所有外交场合上都强调，中国要扛起全球化的大旗了，可是我们仍然能

不断看见，**今天我们的同胞依然带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对此，我一直保持着一种疑问的态度来看待。



1. 它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地标，文化影响辐射到世界各地

关于巴黎圣母院着火一事，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媒体平台，包括官方媒体，都在强调：任何文化遗产的损毁，都是人类难以弥补的共同损失。

也有一些朋友会回应，“尽管这话听起来很动听，但我就是无感，我看到圣母院失火，甚至它彻底毁灭，我都不会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当然可以对此毫无感觉，但这并不表示你能否认它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所谓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它至少包含两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它代表着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所能够达到的某种共同成就，以及开启了某种未来的可能性。

以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为例，或者以它为代表的那些欧洲哥特式建筑，实际上代表了人类技术以及精神文明都曾达到的一种成就高度，这是较为抽象的层面。

另一方面，更具体而言，巴黎圣母院已经不只是法国的一个国家地标，**它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地标，通过法国文化的影响和投射，其实也辐射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甚至被我们的文化所吸收，成为今天文化构成的一部分。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从昨天起被不断提及的法国 19 世纪大作家——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这也是从五四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坛留下深刻影响的一部经典作品。

无数的中国读者曾经读过它、学习过它，又有无数的中国作者受到过它的启发，某种程度上，这部作品早已渗入我们自己的血液当中。



© HUBERT HITIER/AFP/Getty Images

即便从艺术上看也是如此，早期曾有许多留法艺术家归国之后，为整个中国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他们都曾在巴黎圣母院得到启迪，特别是刘海粟先生还曾画过一幅非常动人的巴黎圣母院画作，那你认为它究竟属于中国还是法国呢？

2. “雪耻型民族主义”的焦虑

当然，我相信对于那些叫好的“爱国青年”来说，刚才所说的这些依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我实在好奇这种强烈的情绪是从何而来，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想起我的一位老朋友，政治哲学家刘擎先生，他在十几年前提出过一个概念——他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主义”**。

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那么何谓“雪耻型民族主义”？简单解释就是，我们国家的民族认同本身包含了一种对于巨大创伤的共同体验，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族团结与情感是透过某些负面元素来引发和巩固的**。

什么是负面元素？那就是我们平常时而挂在嘴边的“百年国耻”，它使得我们更加爱国，更加爱我们的民族。而这种爱，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有一天我们能“一雪前耻”。如何雪耻？当然就是自己国家的强大。

理论上，其实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足够强大了，我们其实应该相当自信了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念念不忘这些历史上的耻辱呢？

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总是与时代的变化、环境的要求息息相关。

可能在 80 年代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认为民族主义对我们造成太大的作用影响，但到了**今天的语境**

下，民族主义就再次具有强有力的叙事。

3. 盲目的复仇主义最值得警惕

在这百年国耻的民族记忆之中，有一样是非常具象的，也几乎成为我们百年国耻的中心象征，那就是圆明园。

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做《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在这部作品里，他探讨了圆明园百年来的沧桑历史，以及它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留下的种种印象。



为什么我们会对圆明园念念不忘？我们都知道，英法联军在 1860 年第二次攻打北京之时，火烧圆明园这段往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和创伤。

但是，对于这一段创伤记忆，或许需要像对待一个患有创伤后遗症的人一样，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修复自我内心的创痕，来让我们自己的心态更加健康。

那的确是一次相当痛苦的经历，但是我们能说那是对所有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仇恨吗？

像刘擎先生所述，“复仇主义”（Revanchism）或许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种危险形态。

复仇主义诉诸于一种集体性的欲望：征服敌人来恢复民族的尊严、重获地缘政治的统治地位或者经济优势。极端的复仇主义者主张战争是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的抱负。

但是，最深刻的危险不仅仅在于它对战争的狂热或者说反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在于它极大地

封闭了民族的政治想象与智慧的空间，最终成为一种自我颠覆的运动，将民族引向更为深重的灾难与自我毁灭。
—— 刘擎《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

事实上在当年英法联军做出这样残暴的行径之后，欧洲的许多民众同样表示极度震惊，想必你也看到许多媒体里提及，雨果这位法国国宝级大作家，当时就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谴责英法联军的作为，称这次火烧圆明园的行动是“两个强盗的胜利”。

英国国内也有相当多国会议员抨击他们自己的军人，怎么能在遥远的北京犯下这样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所以即使我们真要仇恨，仇恨的对象应该是“殖民主义”，仇恨的是殖民帝国，以及认为“强权就可以称霸”的那种心态，这才是我们应当针对的对象。

它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要能够坚守一条正义的道路，就算有一天我也强大到那样的程度，我们也不应当做出同样野蛮的行为，否则我们和当年伤害我们的凶手，又有什么区别呢？

4. 记住火烧圆明园的意义，从不在于宣泄仇恨

说回火烧圆明园，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指出，现代中国人之所以不能忘怀一座皇家园林的命运，是因为他们非常困惑，“为何西方人会犯自己订立的国际法，该法明确禁止在战时从平民或国家元首手中，掠夺可以带走的私人财产”，尤其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那一回，因为列强刚刚才在 1899 年加入了禁止战时掠夺的《海牙公约》。

可是，它的意义又不应该仅限于此。因为圆明园的沦落破败，除了西方，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英法联军撤离没多久，附近居民就跑进去洗劫木材了。满清颠覆以后，从军阀到民国政府，从高官权贵到民间盗匪，更是对仅存的遗迹上下其手，巧取豪夺。

1949 年之后，遗址毁灭的过程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池成了大片农地与交错的通路。再来则是「十年浩劫」，圆明园内被砍去了更多树木，增添了不少工厂，里面开始养猪养鸡种地，整个原有地形也被彻底破坏……

尽管今天我们终于再次想要好好保护圆明园，给予妥善的维修，可是这并不表示圆明园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电影拍摄团队将圆明园内的植被人为染黄，也并未将其恢复原貌；也有进入园区的游客，仍然在断壁上、遗址上、树木上留下种种到此一游的刻痕，这样的情况仍然还在各种文物遗迹上发生。

因此，这个故事是复杂的，但它的主旨却可以很简单；那就是尊重历史，珍视我们手中一切宝贵的物质记忆。

5. 巴黎圣母院的建筑意涵，也反映着人性的崇高

说完圆明园，也再提一提巴黎圣母院。850 年来，巴黎圣母院同样经历了许许多多坎坷。16 世纪

的法国动乱，以及更重要的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其实都对巴黎圣母院造成过相当大的破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它更是已经呈现出半废墟的状态。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败落的景象，给予了雨果以灵感，让他写出了《巴黎圣母院》这部对后世造成重大影响的作品。也正是因为雨果这本书的影响力太大了，才引起了当时法国人对圣母院的重新关注。

于是，也就有当年引导全欧洲建筑恢复哥特式建筑潮流的那位伟大的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主持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

可是，当时欧洲人对古迹的修复也不像今天我们全世界流行的观念要修旧如旧，而是对古迹进行一定改造。按照杜克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巴黎圣母院有了新的装点，比如这次在大火中焚毁倒塌的那座塔楼，其实就是杜克后来加上的。

如果你翻看巴黎圣母院最早的图纸，你可能会发现，其实今天的巴黎圣母院根本还没盖完，这就要说到欧洲传统大教堂，尤其是哥特式大教堂的一个特色，那就是修建工作会持续几百年，没完没了。

比如全球大概是唯一一个还没有修建完成的世界文化遗产——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著名建筑师高迪的作品，从 1882 年到现在都还没建设完成，为什么这些大教堂怎么盖都盖不完？

一来是因为早期施工的难度，技术工程各方面的条件不如现在先进；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教堂常常是由城市中的贵族阶级，甚至还有老百姓，大家一起捐钱来建造的。

这些教徒们相信，参与教堂的修建工程对他们个人而言，是灵魂救赎之道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些大教堂其实是盖不完的，因为每一个年代的信徒，每一个年代的老百姓都会希望再为它加上或者修改部分内容，因此大教堂就不断在建，建筑风格也可能不断改变，整个不断修建的过程，

恰恰体现了这种信仰的持续性。



今天我们看到巴黎圣母院，其实也已经糅合了诸多建筑风格在里面，并不纯粹是哥特式的，有浪漫主义的风格，有文艺复兴的风格，也有新古典的东西糅杂其中，而每一个年代的人对圣母院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到了雨果那个年代（19 世纪上半叶），作为一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启蒙主义大作家，他看待这样

本来非常具有宗教意涵的建筑，却对它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个理解恰恰也就是影响后来法国人对圣母院的一种重要理解——

雨果认为，哥特式建筑的崇高，代表着人性可以从无知和邪恶的这种卑下境地，不断挣扎着往上提升，直到一个人性完善的地步。这是一种非常乐观的启蒙精神的体现。

无论如何，今天的巴黎圣母院，已经成为了巴黎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法国的中心。所以这两天我们从各种照片中可以看到，法国人看到巴黎圣母院的焚毁表现出的震惊和悲伤。

有的人整宿站在塞纳河边，对着巴黎圣母院呆视着；有的人忍不住哭泣，还有很多人甚至跪在地上，吟唱圣诗——这都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情感状态。

我甚至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去形容他们所遭受的和经历的，只能想起这样一位巴黎市民，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我来说，圣母院大教堂就是时间。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存在，我小时候进去过，我知道我死了之后它都还会继续存在。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走进去看它一眼”。 🍷

[【返回目录】](#)

穆吉布·马沙尔：斯里兰卡的暴力伤痕：宗派分歧和长期内战

[穆吉布·马沙尔 Mujib Mashal 纽约时报在阿富汗的高级记者。本文首发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纽约时报，翻译：李建芳]



本文作者 穆吉布·马沙尔

在深陷内战的泥潭近三十年之后，斯里兰卡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十年。而在周日，导致超过 200 人死亡的爆炸袭击协同行动将这一平静击碎。

以下是一些背景信息，以帮助您理解在这个小岛国发生的最新事件。

斯里兰卡以绝美的自然风光著称，2018 年一年便吸引了超过 200 万名游客。但它的人民却长期深受暴力困扰。目前尚不清楚这起袭击与其冲突史的关系——或是否有关系。

斯里兰卡于 1948 年成立锡兰自治领，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1972 年更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

但其历史进程大部分时间饱受宗派紧张关系的摧残。近来，该国又被卷入中印地区敌对关系这个更大的困局。

人口与民族构成

约有 2200 万人居住在斯里兰卡往往多元混杂的各个社区。

包括印度教徒在内的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占 12% 以上，穆斯林占不到 10%，天主教徒约 6%。周日爆炸案中至少有三座教堂遭到袭击。



2009 年，斯里兰卡哥达皮提亚一座清真寺
遭泰米尔猛虎组织自杀式爆炸袭击后的景象 图片来源：Reuters

尽管占绝对多数，但近年来，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者一直在煽动一种恐惧心理，即少数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的数量和影响力在不断增加。

2007 年，士兵在搜查少数民族泰米尔人。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佛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一场持续 26 年、直到 2009 年才结束的内战。

泰米尔猛虎组织

在僧伽罗佛教徒掌控下，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少数族群泰米尔人长期被剥夺选举权，进而导致了 1980 年代的内战。

泰米尔猛虎这个武装叛乱组织自称为世俗性质，此前它发起过致命袭击，其中一些属于最早使用自杀式爆炸作为叛乱手段的案例。斯里兰卡军方发起残酷的战役应对，主要集中打击泰米尔人在东北部的据点。

在军方发起大规模行动挫败了泰米尔猛虎组织、除掉其头目之后，内战于 2009 年结束。

尚无确切伤亡数字，但联合国已表示，仅在战争最后阶段，便有多达 4 万平民丧生。

战争过后，伤痕犹在

这些围绕体制性偏见产生、进而导致内战的宿怨，有许多至今未能得到解决。



斯里兰卡 70%以上人口为佛教徒， 2018 年科伦坡一座寺庙内，信徒在烧香拜佛

图片来源: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07 年，士兵在搜查少数民族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佛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一场持续 26 年、直到 2009 年才结束的内战

图片来源: Reuters



在 2018 年的反穆斯林暴力行动中，迪格纳村一所民居毁于佛教暴徒手中，其主人遭杀害

图片来源：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8 年，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

图片来源：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泰米尔人仍在寻找战争中失踪的成千上万亲人，并在竭力夺回仍为军方占据的土地。卫生服务机构则在努力应对数十年暴力冲突留下的巨大创伤。

随着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宗派分歧持续加剧——该国已经历了新一轮的动荡。狭隘的加

深，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源于战后僧伽罗多数派政治人物的趾高气昂。

去年,在佛教暴徒袭击了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商家和民居之后,官员宣布中部城市康提进入紧急状态。

2018 年，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

高层的争斗

斯里兰卡还面临高层的政治紧张局势。

去年推翻总理的企图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宪法危机，险些引发暴力。该国曾一度有两名宣称是总理的人。

去年 10 月，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罢免了总理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而后他任命了继任者、前强人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e)。

在确定拉贾帕克萨无法得到足够多的票以成为总理后，西里塞纳解散了议会。

两个月的危机使斯里兰卡陷入停滞。大街小巷轮番上演各类冲突，各方均有数千名支持者示威游行；而在议会，立法者之间爆发拳脚之争，甚至互相泼洒辣椒粉。

拉贾帕克萨最终作出让步，维克拉马辛哈继续担任总理。 🇱🇰

[【返回目录】](#)

肯尼思·罗斯：民粹主义全球性崛起的危机

[肯尼思·罗斯 Kenneth Roth 人权观察执行董事，毕业于耶鲁法学院和布朗大学，曾任联邦检察官，参与调查军售伊朗案。本文摘编自 2016 年 11 月 6 日人权观察]



本文作者肯尼思·罗斯

人权旨在保护人民免于政府的侵害与漠视。权利对政府的行动划定界限，对政府的作为课以义务。然而，现今新一代的民粹主义者正试图推翻这个保护机制。他们自居为“人民”的代言人，将人权视为他们所谓大多数人意志的绊脚石，妨碍国家抵御他们所谓的安全威胁与邪恶势力。他们不相信人人应享同等权利，主张优先保障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鼓吹一种危险的思想，即在自称代表全民的政府统治下，人民将不再需要为自己主张权利。

民粹主义随著公众对现状日益不满而风行。在西方，许多人因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和不平等加剧而感到失落；骇人的恐攻事件引发民众忧虑和恐惧；还有些人对族群、宗教和种族日益多元的社会感到不安。愈来愈多人认为这些大众关切的问题得不到政府和精英阶层的重视。

随著不满情绪逐渐沸腾，某些政客乘势崛起甚至攫获大权，他们说人权只是在保护恐怖分子或寻求庇护者，不顾多数民众的生命安全、经济福祉与文化偏好。他们以难民、移民和少数群体为替罪羊，真相往往遭到抹杀，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种族歧视和伊斯兰恐惧症则不断滋长。

这种危险趋势可能吞噬当代人权运动的成就。早期人权运动主要关注二次大战的人性浩劫以及伴随冷战而来的压迫。由于亲眼见证政府可能犯下的邪恶暴行，各国陆续通过各种人权条约，冀求限制及遏止未来的人权侵犯。人权保障被认为是让人们活得有尊严的必要条件。随著人权日益获得尊重，也为更自由、更安全、更繁荣的社会奠下基础。

然而，时至今日，愈来愈多人感到人权不是在保护他们免于政府侵害，而是在削弱政府保护他们

的能力。在美国和欧洲，人们心目中的首要威胁是移民，其中夹缠对于文化认同、经济机会和恐怖主义的忧虑。由于民粹主义者的鼓动，愈来愈多民众认为人权只是在保护“他者”而非我群，因此没有存在必要。民粹主义者主张，只要大多数人同意，应可任意限制难民、移民或少数群体的权利。来自国际条约和制度的阻力，在本土主义常较全球主义更受欢迎的今日世界，只能造成人权更加受人厌恶。



2018年6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团队在社交媒体发布的G7峰会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引G7其他六国首脑“不快”，默克尔和她身边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视着特朗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两者之间，注视着默克尔和马克龙，多方表情微妙，充满不确定性。照片被国外网友奉为本届峰会“最佳抓拍”

或许人性原本如此，认同异己比较困难，剥夺他人权利则更易于接受。人们安于相信一种有害的想法，即他们可以选择性地实践权利——剥夺别人的权利，但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人权本质上不容厚此薄彼。或许你对邻居心有不满，但今天你不维护他们的权利，明天你自己的权利也将不保，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人权的根本。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名义侵犯某些人的权利，就是在挖整个人权体系的墙脚，而所谓大多数人的成员总有一天也会需要人权体系的保护。

若不警惕过去一年出现的野心政客——自诩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实则视人民如草芥的法西斯主义者和GCZY之流——我们将自食恶果。当民粹主义者将人权视为实现大多数人意志的绊脚石，他们迟早将把矛头对准异己。当民粹主义者攻击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这种风险将更加提高，因为司法独立旨在维护法治，亦即落实人权对政府行为的制约。

不受约束的多数决主义兴起，以及政府分权制衡机制遭受攻击，或许是当前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危机。

威胁蔓延，应对冷淡

太多西方政治领袖，不去对抗民粹主义兴起，反而流露对人权价值缺乏信心，只愿给予冷淡支持。愿意挺身而出的领导人少之又少，只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偶一为之。

有些领导人似乎学鸵鸟把头埋进沙土，期待民粹主义的风暴早日平息。其他人，若非企图利用民粹主义激情捞取利益，就是设法跟进民粹主义者的政见模糊彼此差异以抵消对手优势。英国首相梅（Theresa May）指责质疑英军在伊拉克实施酷刑的人士为“社运左翼人权律师”。法国总统欧兰德（François Hollande）挪用右翼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策略，企图将其反恐政策重点摆在剥夺法国出生双重国籍人士的国籍，不过后来反悔而放弃这项主张。荷兰政府支持对穆斯林妇女穿戴面纱加以限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呼吁关闭欧盟边界，近来获得许多欧盟国家领袖的支持，使难民陷于险境。这样向民粹主义者东施效颦的做法，只会合理化某些政客对人权价值的攻击。

类似的潮流不只出现在西方。事实上，西方民粹主义者的兴起，似乎鼓舞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更加理直气壮蔑视人权。例如，克里姆林宫积极为总统普亭（Vladimir Putin）的威权统治辩护，指其不比西方国家日益恶化的人权纪录更差。……一如普亭，对异见人士进行了近二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利用一次失败的政变铲除反对党派。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政变夺权后，不断加强镇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公开呼吁将涉嫌吸毒、贩毒者——甚至包括保护他们的人权工作者——就地格杀。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则姑息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对少数教派和族群的恐吓与仇恨犯罪，试图藉此让批评政府的公民组织关门。

在此同时，看穿西方各国偶尔抗议毫不足惧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Bashir al-Assad），靠著俄国、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撑腰，撕毁国际战争法，对该国阿勒颇（Aleppo）东部等反对派占领区的平民加以横暴攻击。数名非洲领导人面对国内或国际控诉自知理亏，竟严词抨击国际刑事法院，其中三人已宣布该国退出该法院。

为制衡上述趋势，亟需广泛重新肯定人权。民粹主义的崛起，势必导致主流政治人物陷入道德挣扎，但不应造成官员或公众放弃根本原则。致力尊重人权的政府比独裁统治更善于防范贪污腐败、自我扩权和恣意妄为，因此能提供民众更好的服务。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政府更能够倾听民意、解民疾苦。尊重人权的政府也更容易在失去人民支持时加以撤换。

但若强人情结和不容忍态度占得上风，世界恐将沦入黑暗时代。我们永远不能低估野心政客，今天他们可以借我们名义牺牲别人的权利，明天当他们真正的目的——保有权力——受阻，就会把我们的权利抛到一边。

特朗普的危险论调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功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是这种不容忍政治的活生生实例。时而明目张胆，时而拐弯抹角，他以违悖尊严与平等基本原则的方式，回应美国人对经济停滞与社会日益多元的不满情绪。他利用刻板形象丑化移民和妖魔化难民，辱骂一名法官的墨西哥血缘，嘲笑一名记者肢体障碍，一再否认性侵指控，并且誓言要让女性自行控制生育的能力向后倒退。

更糟的是，他的论述总是华而不实。例如，他的选战大部分著重于攻击贸易协定和全球经济，但他又把无证移民当做替罪羊，指责他们偷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但他扬言遣返大量移民，包括已在美国安身立命、对美国经济有所贡献者，对找回失去已久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并无助益。美国近年来就业持续增长，而某些人的所得停滞，很难归咎于无证移民，他们的人数近年来没有大幅净增减，而且通常做的是大多数美国公民不愿从事的工作。

候选人特朗普对抗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方案也同样无效——甚至会有反效果——因为他妖魔化穆斯林社群，但穆斯林社群的配合却是侦知恐攻阴谋的关键。他将难民描绘为安全威胁，殊不知他们在入境前受到比一般商务、教育或观光旅客更严格的检验。特朗普不愿限制过度滥用的措施，例如大规模侦监，但这种措施不仅侵犯隐私，而且已证明不比司法监督下锁定对象的侦监更为有效。

特朗普甚至考虑恢复使用某些酷刑，例如水刑板，浑然不知小布什总统的“高级侦讯技术”早已成为恐怖主义招收新血的利器。当他和后来被他提名为国防部长的将军一席谈话后终于知道酷刑没有实效，但这丝毫无法让人宽心，因为他马上又宣称将义无反顾下令实施酷刑，“只要这是美国人民的要求”。谁来诠释美国人民的愿望？大概是他自己。但他忽略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法律和条约都不允许对人施加这样的残酷和痛苦。

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

欧洲也正在兴起一股民粹主义，它将经济停滞归咎于来自欧盟外部或内部的移民。这股潮流最醒目的展现，就属英国脱欧。然而，若支持脱欧人士是为了阻止移民而投下赞成票，代价恐怕是英国经济更加恶化。

在欧陆各国，许多官员和政治人物热中追寻消逝已久、甚至从未存在的纯粹国族主义时代，忽略事实上移民社群在大多数国家早已根深柢固，而来自上层精英的仇外心理不利于促进移民融入社会发挥生产力。某些国家领导人的反难民政策简直是自打嘴巴的悲剧，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即为一例：欧洲过去展臂迎接遭苏联压迫的匈牙利难民，今天欧尔班政府却想尽办法让逃离战火与迫害的新难民度日如年。

没有一个国家有义务接受所有上门求助的人。但国际法对管控移民的手段有所限制。寻求庇护者必须得到公正审判，若其主张合理，应予难民庇护。不得将任何人推回战争、迫害或酷刑。除有特殊例

外情况，移民居留多年或与本地人建立家属关系后应给予取得合法地位的途径。不得任意拘押，遣送程序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各国政府有权禁止和遣返经济移民。

与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不同，政府应充分尊重国内合法居留移民社群的权利。在住房、教育或就业方面都不得有任何歧视。不论法律地位为何，每个人都有权利受到警察保护以及司法系统公正对待。

各国政府应注资协助移民融入并充分参与社会。政府官员特别有责任驳斥民粹主义的仇恨与不容忍论调，表明对法院独立、公正维护人权的信心。这是最好的方式，确保国家在民族日益多元化之后仍能保持民主传统——历史证明，后者是通往繁荣的终南捷径。

特别在欧洲，有些政治人物为了辩护抵制移民——尤其是穆斯林——便指责移民企图复制其所来自的特定国家对女性或同性恋的压迫。然而，回应压迫最好的方法是拒绝压迫——许多移民就是因为受压迫才逃出来的——并且确保社会每一分子都能尊重他人权利。以保护他人权利的名义，剥夺部分社会成员——在当前氛围下主要指穆斯林——的权利，无助于解决问题。权利的选择性适用，将损害权利本质上的普遍性。

土耳其与埃及的威权主义崛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趋独裁专制，足见领导人借口大多数民意践踏人权的危险。近几年来，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改建公园，到修改宪法建立总统制，他对批评其施政计划的人士日渐不予容忍。

过去一年，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发展党利用一场造成数百人牺牲的失败政变发动镇压，对象不仅是他指控策划政变的流亡教士葛兰（Fethullah Gülen）党羽，还包括被认为支持葛兰的其他数千名人士。紧急状态的宣布，成为打压异见人士、关闭独立媒体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大好机会。此外，藉口追查库尔德工人党（PKK），政府将这个亲库尔德族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全都逮捕下狱，该党多名地方首长也遭撤换。

由于许多土耳其民众为政变失败感到庆幸，埃尔多安政府在政变后获得跨党派的广泛支持。但镇压的先例既已树立，司法独立和其他法治规范又受到重创，埃尔多安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扩大打压。西方各国领袖或许还能及时发表强硬的声明，但其他方面的利益，不论是阻止难民涌入欧洲或抵抗自称伊斯兰国的 ISIS 组织，往往使他们三缄其口。

塞西政府统治下的埃及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由于穆尔西（Mohamed Morsy）总统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短暂执政不得人心，2013 年由塞西领导的军事政变获得众多埃及人欢迎。但塞西的高压统治比起长期独裁而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被推翻的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2013 年 8 月，塞西一手主导在一天内杀害至少 817 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这是当代最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之一。

许多埃及人以为塞西打击的目标仅仅是伊斯兰主义者，但他同时主导扼杀政治空间，关闭所有人权团体、独立媒体和反对党派，拘捕数万囚犯，其中大多遭受酷刑，且几乎不经任何司法程序。

强人的肤浅吸引力

披上大多数民意外衣的民粹主义浪潮，伴随著强人统治的迷思，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倘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重于一切，顺著这种思维，何不乾脆支持那位理直气壮主张“多数决”观点——尽管可能是自私自利——的独裁者，把异议分子踩在脚下。

然而当前这股民粹主义激情很容易让人忽略掉强人统治的长远风险。以普亭为例，俄罗斯的经济就因他所主导的腐败裙带政治而日益衰落，当油价高涨时无法多元发展，一旦油价下跌就面临崩溃。因为害怕 2011 年起在莫斯科等各大城市爆发的民众示威抗议再起并向外蔓延，普亭企图加以预防，对集会和言论实施严格限制，对网络异议施加前所未有的打压，并瘫痪公民社会组织。

克里姆林宫为了巩固普亭独裁地位，刺激他日渐下滑的支持率，利用俄国占领克里米亚事件在民间煽动民族主义，但却招致欧盟制裁，使下行的经济雪上加霜。他又出兵叙利亚，以俄国轰炸机支持阿萨德对平民的屠杀，导致解除经济制裁从政治角度而言更加遥不可及。直到今天，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老手们仍试图将经济状况恶化归咎于所谓西方削弱俄国的阴谋。然而，随著经济毫无起色，俄国政府的强词夺理已愈来愈难说服俄国民众。

.....

同样趋势也出现在其他独裁统治国家。委内瑞拉故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发动、现由其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号称造福贫苦百姓，实则为他们带来经济灾难。民众所得到的只是恶性通货膨胀，食物和药品严重短缺，以及在世界石油藏量第一的国家过著穷困生活。政府派出军警临检移民和低收入社区，却四处遭举报侵犯人权，包括法外处决、任意遣返、迫迁和强拆住房。

同时，总统马杜罗操纵司法，派出情治人员任意拘捕、起诉反对党政治人物和民间异见人士，造成占国民大会多数的反对党难以履行立法职能，还通过选举委员会的盟友阻挠罢免公投。

事实上，历来独裁者总是图利自己而非人民。即使是被当做典范的威权主义发展国家，如埃塞俄比亚与卢旺达，其政府制造的祸端也经不起详细检验。埃塞俄比亚政府强迫农民和牧民迁入基本服务阙如的村庄，以便将土地转让给大型农业项目。卢旺达政府以美化市容为名，将小贩和乞丐关进卫生极差的拘留所，还殴打他们。中亚各国在苏联长期统治下民生凋蔽，却盛产政治强人。东南亚各国看似生机蓬勃，如今也因泰国军政府僵化统治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Najib Razak）的政府贪污腐败而使经济发展面临危机。

公民组织与国际刑事法院遭受攻击

非洲人权保障遭遇的最严重威胁，部分源自强人统治者不愿和平转移政权，反而透过暴力和立法压制批评。有些非洲领导人已经废除或延长任期限制——即所谓宪法政变——另外一些领导人则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选举不公正或舞弊的活动。赤道几内亚的姆巴索戈（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乌干达的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Robert Mugabe）——在位皆已逾 30 年——皆已修改宪法继续延任。

近年内各国总统寻求延长任期的行动，有时通过镇压一切反对者而达成，例如卢旺达，有时则通过暴力镇压抗议活动而成功，例如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类似手段限制公民社会团体和独立媒体，切断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服务，查禁反对党。对公民社会的攻击主要针对资金来源下手——埃塞俄比亚是个中翘楚——这些政府平时积极招引外国援助、贸易和投资，却令人费解地从中作梗，阻挠公民团体寻求海外捐助。

这些政治强人拒绝交出权力，有时是因为在位时曾犯下罪行，担心下台后可能遭到司法追究。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首先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ICC）的计划，因为在他统治期间的暴力镇压已使他成为头号起诉目标。踵继其后的是以独裁统治恶名昭彰的冈比亚总统贾梅（Yahya Jammeh），不过他旋即败选下台，而新任总统当选人巴洛（Adama Barrow）已表示将推翻贾梅退出法院的决定。南非向来是非洲人权与正义的领袖，但总统祖玛（Jacob Zuma）决定启动退出 ICC 程序，当时他贪污嫌疑缠身，又因公公然藐视法院命令、准许遭 ICC 以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席尔（Omar al-Bashir）逃离南非而遭国内人士质疑违法。在此同时，由于证人受到压力以及政府阻挠检方调查，ICC 撤销了对肯尼亚总统肯雅塔（Uhuru Kenyatta）的控诉，导致非洲联盟对 ICC 的抨击更加猛烈。

不过，少数几名非洲领导人不能代表所有非洲人，由非洲各国公民团体联名支持 ICC 的行动可见一斑。这些团体并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例如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和加纳。这些非洲人能够看穿所谓 ICC 是反非洲（anti-African）机构的错误说法。事实上，ICC 首席检察官就是非洲人士，她致力于终结有罪免责，因为众多非洲人民都因此惨遭荼毒而求助无门。

ICC 在 2015 全年集中调查非洲受害者，其软肋是美、中、俄等世界强权并未加入。截至 2016 年 11 月，该法院尚未对非洲以外初步调查中的数起重大案件正式立案，例如美国官员涉嫌在阿富汗实施酷刑却未被起诉，或以色列官员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建立非法的移民屯垦点。

倘若反对法院的一方真正关注司法公正，他们应当带头鼓励完成前述调查，或施压俄、中两国停止利用安理会否决权阻挠 ICC 对叙利亚暴行取得管辖权。但他们对更广泛的正义需求不发一言，可见其主要目的是回避解决本国的正义问题。好几个非洲国家希望以一个非洲法院加以取代，让现任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得以豁免控诉，足以说明问题。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攻击不仅来自非洲，但共同目的是企图免除罪责。俄罗斯尚未加入该法院，但当 ICC 检察官办公室对 2008 年格鲁吉亚 - 俄罗斯冲突中可能存在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以及将乌克兰情势纳入审查之后，俄国便宣布撤回签署——虽然这纯属象征性动作，不具实质意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是在 ICC 检察官办公室警告杜特尔特鼓吹就地正法可能受到调查后，抨击该法院是个“没有用 (useless)”的机构。

ICC 的职权是在为内国法院无法处理的世上最严重罪行伸张正义，当然免不了开罪那些不愿被追责的政治强权。它的成效有赖于支持者在政治上和实质上给予坚定奥援。

叙利亚平民遭受攻击

叙利亚或许是当前人权标准面临的最致命威胁。没有比禁止攻击平民更为基本的战时规范。但阿萨德的军事策略一直是恣意且无区别地攻击平民和非军事建筑物，例如医院，只要这些目标是处在该国武装反对团体控制区域之内。

藉著杀伤力强大的空袭攻势，包括“桶爆弹”、集束弹药、密集火炮和偶尔使用的化学武器，阿萨德将叙利亚各大城市里里外外夷为焦土，目的是赶跑所有居民，使反对派武力无法获得根据地。他的策略还包括彻底围困城镇，使居民因粮食断绝而被迫投降。

尽管犯下如此凶残的战争罪行，阿萨德仍自 2015 年 9 月起获得俄军支援。他的攻击火力因此大幅提升，策略却未见改变。事实上，他这种战略和克里姆林宫在 1999 到 2000 年为歼灭叛军而围攻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手段如出一辙。

这种攻击平民的战争罪行，是造成叙利亚民众大批逃亡的主要原因，国际社会却未尽力法办其罪魁祸首。全国半数人民被迫离乡背井，约 480 万人已逃往邻近各国，尤其是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其中约有一百万人逃往欧洲。然而西方国家提到叙利亚，总是以 ISIS 为关注焦点。ISIS 的确要为惨无人道的暴行负责，其威胁性也的确远超过叙利亚和伊拉克根据地，但它在叙利亚造成的平民死伤人数远远不及阿萨德。当地信息源估计，叙利亚平民死亡人数约有百分之 90 应由阿萨德部队及其盟军负责。

由于阿萨德的政治生命现已完全仰赖于俄国军事支援，普亭对阿萨德的行为具有巨大影响力。但我们看不出克里姆林宫曾经善用其影响力阻止平民遭到杀戮。相反地，俄军轰炸机规律性参与攻击行动，悲惨的阿勒颇战役即是一例。

然而，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欧巴马政府，未能下定决心施压俄国善用其影响力，而是著重以俄国为和谈伙伴——即便谈判陷入无止尽的原地打转，而攻击平民的战略造成叙利亚反对派武力日益失去与政府抗衡的筹码。

从其竞选言论来看，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似乎决心让美国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 ISIS，甚至提议为此

与普亨和阿萨德站上同一阵线,显然忽略他们对付 ISIS 多么漫不经心,而且他们的暴行正好有助于 ISIS 不断补充新血。即便 ISIS 最终遭到军事挫败,那些暴行也很容易催化出新的极端组织,正如 ISIS 本身也是因为同样的暴行而由伊拉克盖达组织的余烬中窜起。

重新肯定人权价值的必要

为了抵抗当前对人权的全球性攻讦,必须强烈地重申和捍卫做为人权基础的一些基本价值。

许多人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公民社会团体,特别是维权组织,必须保护面临威胁的公民行动空间,建立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盟以彰显共同的人权关注,拉近南 - 北分歧以团结力量对抗显然正在互相学习的各国独裁者。

媒体机构应协助凸显这种危险趋势的临近,在报导当天人物言行的同时,分析其长期后果,尤应加强揭露和驳斥特定党派人士的政治宣传及其炮制的“假新闻”。

自诩尊重人权的各国政府必须拿出更加一贯的态度,为基本原则辩护。这包括拉美、非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它们虽然经常投票支持其他国家倡导的议案,但不论在联合国或在各自的双边外交上都很少发挥领导作用。

最终,责任在于大众。野心政客不断散播似是而非的观念,对真正的问题提出错误的解释和廉价的解决方案,藉此累聚民众支持。拨乱反正的最佳途径,就是由大众要求将政治建立在尊重人权的民主政治所以依存的真理与价值之上。若不存在反对的声音,民粹主义者将大行其道。唯有..... 公民组织、政治党派、传统与社交媒体——才能保卫那些即使在患难中仍为许多人所珍视的价值。

谎言不会因为大群网军或党徒反覆宣传就变成真理。以讹传讹的回声效应并非无往不利。正因事实毕竟胜于雄辩,独裁者才极力检查言论,打压对其不利的真相、尤其是人权侵害的报导。

价值是脆弱的。由于人权价值首先取决于同情他人的能力——肯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重要——很容易因为野心政客的排他诉求而动摇。一个社会必须不断滋养尊重人权的文化,才不会因为一时的恐惧而放弃民主政治所以奠基的智慧。 ■■■

| 编者注: 本文摘编自 2016 年 11 月 6 日人权观察, 原题: 民粹主义崛起的危机 人权价值面临的全球性攻击。

[【返回目录】](#)

约翰·朱迪斯：移民问题是如何一步步刺激欧洲右翼的？

[约翰·朱迪斯 John B.Judis 美国政治分析家、作家、资深记者，《新共和国》杂志高级编辑，《国家》杂志资深专栏作家。本文转载自 2019-03-17 观察者网。部分图片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约翰·朱迪斯

关键字 英国脱欧公投欧洲移民问题法国勒庞欧洲民粹崛起新西兰枪击案

3月15日，新西兰南岛克莱斯特彻奇（Christchurch，又名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49人死亡，其中多为在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民众。

一份在网上流传的“自述书”显示，嫌犯——28岁白人男子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宣扬自己反移民、反穆斯林理念，表示要“发动屠杀报复入侵者”。

新西兰枪击事件发生后，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等欧洲政要们纷纷发表声明，一致谴责这起恶性事件。各国政要们态度一致，也是心有戚戚，毕竟作为大多数中东移民的目的地，欧洲已经容纳了270多万中东难民，他们带来的就业、福利、安全压力，早已引发本国民众不满，一波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席卷欧洲，危机四伏。

美国政治分析家、资深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曾著书《民粹主义大爆炸》（The Populist Explosion），对欧美民粹主义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的梳理。其认为，欧洲移民人数的快速增加，给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增添了筹码。本文为其书摘，录入时略有修订。

欧洲移民人数快速增长、工作机会不再充足这一事实给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增添了砝码。

从积极雇用到反对抱怨

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雇用外籍工人。1956年，西德雇用

了 9.5 万名外籍工人，到 1966 年，这一数字增至 130 万。1946 年至 1970 年间，200 万名外来工人及他们的 69 万家属进入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丹麦和瑞典也实施了相同的劳动力引进计划。

在这些国家，雇主开始不依靠政府部门，独立招聘雇员。瑞典等国家向愿意来欧洲工作的移民打开了国界。法国等前殖民强国鼓励曾为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来法国工作。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410 万外籍工人在德国工作；在瑞士，这一数字是 100 万；法国则为 340 万。

在这一时期，西欧几乎没出现过任何反移民情绪。移民并不会与欧洲各国本国国民竞争饭碗，欧洲人也认为，这些外国人只是暂时来此工作，他们总会回国。

情况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改变。彼时，劳动力不再短缺，反而出现了过剩的情况。西欧不再正式雇用外籍工人，甚至提出为外籍工人提供资金补贴，鼓励他们回国。然而，这一措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人们愿意回国，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劳工则留了下来。

非洲和中东的经济条件远比遭受经济衰退打击的欧洲糟糕，这些地区的工人不仅留了下来，还利用欧洲法律之便，将家人也带到欧洲，而他们的生育率远远高于欧洲各国的本国国民。结果是，移民人数及来自非欧洲社会的移民占总移民人口的比例双双持续上升。在法国，从 1968 年至 1982 年，来自北非西部马格利布地区的移民比例增加了 16%。



马格利布地区地理位置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难民人数急剧上升，这些寻求庇护的难民进一步扩大了非欧洲移民人群的比例——从 1983 年的 7.5 万人增至 1989 年的 32 万人。自此，该数字持续攀升。在丹麦，非欧洲移民人数从 1980 年至 2005 年增加了 268902 人，增长率为 520%。

大多数移民初代从事的是制造业的工作，而今天的移民要么失业，要么在酒店、饭馆或建筑工地从事低端工作。他们聚集在下层社区和郊区，巴黎、马赛、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鹿特丹和哥本哈根到

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移民聚居的社区，犯罪率飙升，这些社区（穆斯林人口比例较大）往往与本国人聚集的社区在文化上处于隔绝状态。



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起，人们已经开始对非欧洲国家移民的涌入感到恐惧和愤怒：

1991 年欧洲委员会发起的欧盟民意调查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 12 国中，23%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该接受来自地中海南岸国家的移民。在法国，这个数字是 33%；在丹麦，这个数字是 25%。56% 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法国接纳了过多移民，24% 认为法国不应为难民提供庇护。

自 1988 年起，调查结果的变化也非常显著。1988 年秋天的调查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中 18% 的受访者希望限制移民权利，到了 1991 年，这一数字升至 33%。

根据 2002 年第一份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欧洲人对移民的首要抱怨（按照内容排列顺序）是：推高了犯罪率、享受的社会福利高于所缴纳的税款、抢走了本国人的工作。然而，许多欧洲领导者忽视，甚至贬损国民的这些情绪。研究欧洲人对移民态度的欧洲委员会被称作“挑起欧洲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调查委员会”。

右翼民粹主义党借机崛起

最初，各个政治党派，特别是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提倡接纳（包括非法进入欧洲的移民在内的）所有外国移民。这给右翼民粹主义党派留下了可填补的政治真空地带。

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期，这些民粹政党、其他更老牌的民粹政党及许多新生

民粹政党开始在西欧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国民阵线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选中吸引了 10%至 15%不等的票数；在 2002 年的大选中，其总统候选人勒庞在首轮选举中斩获 16.8%的票数，后又在选举的关键时刻击败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

丹麦人民党于 1998 年首次参加总统大选，获得 7%的票数；2001 年 11 月，该党获得了 13%的票数，位列第三。

奥地利自由党所获的票数从 1990 年的 16.1%猛增至 1999 年的 26.9%。

瑞士人民党所获票数从 1991 年的 11.9%升至 1999 年的 22.5%。

挪威进步党所获票数从 1985 年的 3.5%升至 1989 年的 13%，以及 1997 年的 15.3%，最终成为挪威第二大党。

这些党派之所以能够崛起，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倾听了民众对非欧洲移民及难民的不满。在 20 世纪最后的 20 年当中，这些党派将注意力从共产主义和税收制度转向移民问题。

1992 年秋，奥地利自由党宣布了“奥地利第一”（Austria First）计划，其中包括通过修改宪法确定奥地利为非移民国家。

挪威进步党曾因移民问题产生党内分歧，但在 1997 年的大选中采取了强硬立场，这一举措将其选民票数从 1993 年的 6.3%提升至当年的 15.3%。

1995 年脱胎于进步党而成立的新丹麦人民党提出了一项包括了十个要点的计划，呼吁遣返难民、废除社会民主党允许移民三年后参加地区选举投票的立法。

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他对欧洲移民政治的研究中将丹麦人民党描述为“对移民问题最为执念的欧洲政党”。



丹麦人民党现任主席 Kristian Thulesen Dahl 图片来源：东方 IC

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丹麦基本上逃过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衰退。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丹麦的福利政策最慷慨，经济不平等也最轻微。人们对移民和难民的抨击多产生于社会文化方面，而并不完全出于经济担忧。

丹麦人不担心移民会抢夺他们的工作，他们反感的是，移民不工作，却免费搭乘丹麦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便车。（任举一例，丹麦政府为失业者连续四年无偿支付月薪，金额为其先前月薪的 90%。）丹麦人对这一点的担忧有经济考虑，但更多的是出于他们对本国福利制度的理解——丹麦的高福利基于高税收，人们在工作和家庭上分享相同的价值观，相互信任，不会想要占国家慷慨之便宜。

而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移民进入丹麦，人们对移民的批评也有所增加，并愈发体现在犯罪率和宗教活动上。



索伦·克拉鲁普 图片来源: jyllands-posten

人民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受路德教派牧师索伦·克拉鲁普（Søren Krarup）的影响。“在格利斯楚普和人民党之间有一道缝隙，”《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专栏作家、曾就克拉鲁普著书的迈克尔·亚尔文（Mikael Jalving）解释道，“而克拉鲁普填补了这道缝隙。”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克拉鲁普就坚持认为，丹麦人秉持着某种深受路德派教义影响的特殊文化，而路德派将伊斯兰教放置在其对立面。克拉鲁普本人认为伊斯兰教并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更是一场政治运动。

克拉鲁普对丹麦移民政策的讨伐也源于丹麦议会 1983 年通过的某项《移民法》，《移民法》对那些从两伊战争中逃至欧洲的难民表示欢迎；该法案通过后，每年不再是几百人，而是有成千上万名难民进入丹麦。

克拉鲁普谴责该法案允许大量难民“不加控制、不加节制地踏过我们的国界”，这是“法律上的自杀行为”。1997年，克拉鲁普受邀在新组建的人民党党代表大会上演讲；2001年，他代表人民党，通过选举进入议会，成为议会的移民归化委员会负责人。

人民党的选举极具偏见和煽动性。1999年该党的一张选举海报展示了一位身着布卡的女性，上面的文字是：“你的丹麦：一个会发生强奸、暴力、团伙犯罪、存在强迫婚姻、女性受到压迫、没有安全感的多种族社会。”

主要党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抨击人民党及其领导者、曾经从事家庭健康护理工作的皮娅·柯丝高。在当年的议会辩论中，社会民主党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对柯丝高说：“你不是家养的。”他用的是 *stuerene* 一词，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没有学会在小盒子里小便的动物。

不过，柯丝高是笑到最后的人。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攻击美国后，对穆斯林移民的担忧在欧洲增长蔓延。在11月的大选中，整个大选被移民议题主导了。人民党获得了13%的选票，从社会民主党手中成功夺去了自1924年该党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的占据议会最多席位的纪录。大多数蓝领工作者支持人民党和自由党。

早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问题在法国社会就已经与穆斯林融合问题密不可分；当时，就穆斯林女孩是否应该戴头巾去学校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争议。1995年，某群体在巴黎地铁上引爆炸弹；2002年4月，“9·11”事件的发生加剧了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担忧，这种情绪也帮助了让-玛丽·勒庞击败若斯潘（此前若斯潘曾让8万名移民非法进入法国的行为合法化）。



让-玛丽·勒庞

图片来源：© AFP 2019 / Bertrand Guay

荷兰社会也存在相似的担忧，并引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大选。

荷兰的主要党领导层强烈支持移民及建构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荷兰社会。而持异见的中间民主派

领袖汉斯·扬马特 (Hans Janmaat) 则早在 1997 年就宣布, “荷兰不是移民国家”, “一旦掌握机会和权力, 我们将废除多元文化社会”。后来扬马特因煽动种族仇恨受到指控, 并被定罪。

2002 年, 当 “9·11” 事件的阴影还深深笼罩全世界, 曾因反伊斯兰观点被逐出某一政党的公共演说家、杂志专栏作者平·佛图恩 (Pim Fortuyn) 就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平·佛图恩党 (the Pim Fortuyn List), 反对伊斯兰教对荷兰的影响。

就在距离大选日仅仅九天之时, 佛图恩被一个左翼活动家刺杀了, 此人反对佛图恩对伊斯兰教的攻击。然而在大选中, 平·佛图恩党仍旧获得了 17% 的选票, 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但失去了佛图恩, 该党最终分崩离析。

2006 年, 一个非常成功的政党——基尔特·威尔德斯的自由党——继承了平·佛图恩党的主张。



有人将平·佛图恩头像刺在背上 图片来源: 东方 IC

扩充工薪阶层选民

随着民粹主义政党对移民政策的态度获得支持, 其政治基础也愈加广泛。

国民阵线和自由党等第一批民粹主义政党是小布尔乔亚政党, 其成员主要是来自乡村小镇的小型业主和小农场主——与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基础重合,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们引领了欧洲的右翼势力。

然而,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欧洲民粹党派选择通过扩充工薪阶层选民基础来增长壮大, 而工薪阶层传统上支持的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和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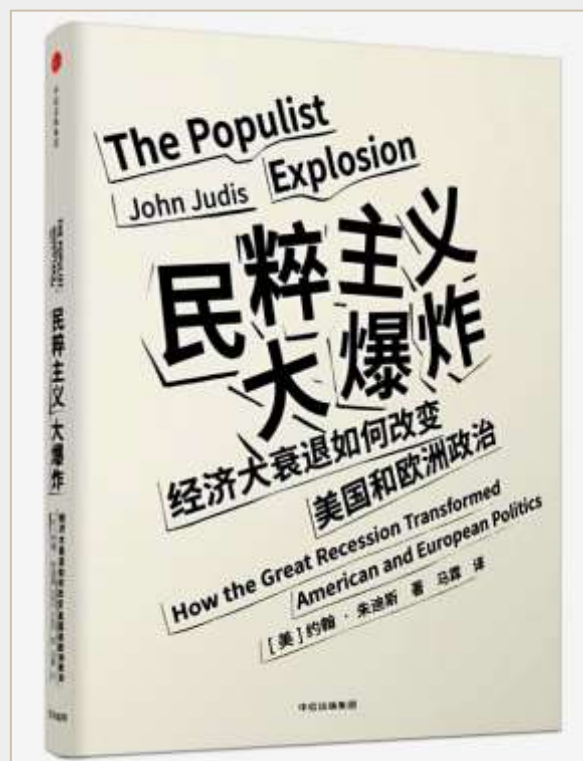
在法国, 勒庞的国民阵线逐渐在北方赢得以蓝领阶层为主的城镇的支持。曾于 1988 年总统大选期间为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投票的选民中, 有 1/3 在 1995 年的大选中转而支持勒庞。“我们是工薪阶层的政党”, 勒庞骄傲地声称。

这些政党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并非仅仅因为其对移民的批判，其他原因还包括，这些曾经代表了小企业主反税、反政府观点的政党正在张开双臂，拥抱社会福利和政府治理方面的部分社会民主主张：

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成为了福利国家的捍卫者，该党不再呼吁废除个人所得税；

丹麦的人民党也与上一代人的反税理念说再见，成为丹麦公共部门所施慷慨的拥护者，当然，条件是这些福利仅为丹麦人享用；

挪威的进步党在 1997 年的大选中也采取了相似策略。



《民粹主义大爆炸》 约翰·朱迪斯 著，中信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出版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奥地利，曾秉持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自由党，将执政党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纳为己用。为了加入欧盟，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的人民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领导了奥地利囊括各个行业的大范围私有化进程，导致 10 万份工作在这一进程中丧失。自由党迎合了公众对这一举措的愤怒，扛起福利国家大旗，并大力批判欧盟的经济和全球化政策。这一招非常有效。在 1986 年的选举中，该党 10% 的选票来自蓝领工人；到了 1999 年，这个数字增长至 47%。

西欧范围内的其他右翼政党也收获了相似的成果。得益于其对移民和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曾经的小布尔乔亚如今已经是工薪阶层的代言人了。 🇺🇸

[【返回目录】](#)

邓聿文：以政改姿态化解民族主义带给中国的难题

[**邓聿文** 记者、作家、评论员。本文首发于 2018-05-25 FT 中文网]



本文作者**邓聿文**

近日中美达成经贸谈判联合声明后，不同人群基于不同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做出不同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但认为中国输了这场谈判的人似乎占多数，这其中，包括原先被官媒鼓动起来的、期望中国政府对谈判持强硬态度的国内民族主义者和民粹派，他们看到这个结果后，认定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做了重大让步，于是失望情绪溢于言表。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关系本身，本来不应该是目前这个样子，对此，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宣传要负很大责任。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官媒天天宣扬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可以傲视群雄，不把美国放在眼里，这无疑刺激了美国尤其美国鹰派的神经，觉得再这样下去，美国很快就会沦为二等国家，世界秩序将由中国主导。而在美国对中国祭起 301 调查大棒以及制裁中兴后，官媒以及某些官方和民间学者，又频频向美国放狠话，鼓吹中国要坚定地和美国打贸易战，宣扬中国必赢，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官方也只能对美国强硬表态，“奉陪到底”。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场贸易战是官媒和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点燃或引起的，这么说有本末倒置之嫌，将因果颠倒了过来，但中国的民粹和民族主义情绪确实与此有很大关联，至少是一个重要的间接因素。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鼓动起来，就会制约官方政策的调整和妥协空间，使得官方在对外

事务中处理一些棘手难题，特别是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重大利益关系的事情时，只能奉行以强硬对强硬的策略。因为一旦中国政府表现看起来“软弱”一点，会遭到国内舆论的讨伐和不满。如此一来，事情就很容易失去某些解决时机，进而使问题更加恶化。

那么，中国社会的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股情绪（其实是一股）是怎样被调动和激化起来的？追根溯源，是执政党有意识地向民众倡导和灌输的结果。自从人类进入民族国家状态，有明确的民族意识后，每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都在有意无意，或明或潜地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念去引导大众，即使如美国，以移民著称，大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存在的，只是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所以，有民族主义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关键是民族主义的限度。

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将民族主义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并不将治国的理念和政策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政权也不靠民族主义赢得合法性。它们的合法性是民众的选票即民主，纵然，一些政党和候选人在竞选时，会打民粹和民族牌，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现象在西方国家也很明显，可总的来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没有成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民族主义充满警惕。

然而，中国和多数国家不同，执政党是将自己的统治诉诸于大众的爱国和民族热情。中国近代以来受压迫和贫穷的历史，同眼下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常被执政党用做历史选择其执政的最强大理由。当今领导人就强调：“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 尽管执政党成立时，是以国际主义为自己使命的。 🇨🇳

[【返回目录】](#)

孙兴杰：埃尔多安总拿新西兰枪击案说事，有何深意？

[孙兴杰 历史学（国际关系史）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本文转载自2019年03月25日中国网]



本文作者孙兴杰

在新西兰发生的恶性枪击事件，造成了近百人的伤亡，被认为是新西兰最黑暗的一天。万里之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选举集会上不仅展示了已经在网上删掉了的枪击事件的视频，而且认为这是世界上种族主义和反伊斯兰气焰高涨的新案例。埃尔多安显然将事件定义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似乎在埃尔多安的身上得到了印证。

新西兰两座清真寺遭到了一名来自澳大利亚枪手塔兰特的“屠杀”，塔兰特发表在网络上的“自述书”的确是有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情绪。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这是为几年前北欧的一位死于穆斯林凶手的小女孩复仇。不可否认，伊斯兰国兴起与覆灭的几年之间，加上大量的中东难民涌入欧洲，西方社会对伊斯兰的恐惧症也是与日俱增，当然，这与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活动是分不开的。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地方选举之际，在新西兰枪击事件问题上大发言论，当然是为了进行政治动员。正发党的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埃尔多安以及正发党是站在伊斯兰世界的立场上发声，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边界。埃尔多安要求新西兰判处塔兰特死刑，同时认为这次事件是对土耳其的测试。塔兰特并不是新西兰公民，另外，新西兰处理这次事件的时候并没有挑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问题。显然，这些言论已经超越了正常外交的底线，新西兰也作出了反应，将派外长访问土耳其质问埃尔多安。



雷杰甫·塔伊甫·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土耳其政治人物，伊斯兰主义者，新奥斯曼主义及民族保守主义者，
曾连任 3 届土耳其总理，现任土耳其总统、正义与发展党领袖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发表推文谴责“野蛮的恐怖主义袭击”，同时说，伊斯兰恐惧症与仇恨在西方国家已然升高，助长这一趋势的政治人物和媒体要对这起令人发指的攻击负相同的责任。显然，土耳其已经大大渲染了新西兰枪击事件的文明冲突的色彩。除了利用这一事件进行选举的动员之外，更重要的是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和定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凯末尔奠定的世俗化国家的传统正在坍塌，埃尔多安一直在推动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已经是奥斯曼主义、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叠加。加入欧盟早已不在埃尔多安的选项之中，在 1915 年加里波利半岛战役纪念活动上，埃尔多安说，我们在这里已经 1000 年了，如果上帝愿意，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直到世界末日来临。加里波利半岛战役是一战之间土耳其与英国及其联军的战役，战争期间，双方当然也会利用“文明之战”进行动员。吊诡的是，凯末尔就是在一战中成长为土耳其的领导人，但是建国之后选择了西化的道路，而现在埃尔多安显然走向了反面。

恐怖主义是人类面临的威胁，尤其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多元主义已经是现实，尤其是欧美社会已经有大量的穆斯林公民，突出宗教的边界会加剧社会的撕裂，新西兰之所以没有突出宗教的矛盾，也是为了维系社会的稳定。而埃尔多安则利用了这次事件对本国社会进行政治动员，并且有意夸大枪击事件的“文明冲突”的含义，多少有些趁火打劫的意味。 ❷

[【返回目录】](#)

陈嘉映：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输给科学家的？

[陈嘉映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聘终身教授、紫江学者。本文首发于 2018-06-18 思想潮，中评周刊-作者授权文稿]



本文作者陈嘉映教授 图片来源：中评网

在近代科学滥觞之际，人们曾因科学与宗教真理相冲突而质疑科学的真理性。后来又有浪漫主义对科学世界观提出强烈抗议。近几十年来，则又爆发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即所谓两种文化之争。

1959年，有一个科学家，C.P.斯诺，在剑桥做了一个讲演，题目叫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斯诺站在科学文化一边，对人文学者的流行态度提出质疑。

当时所谓人文主要是指文学，在当时的大学里，文学教授很骄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不懂莎士比亚，不会引用荷马，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技术你可以到专科学校去学，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

斯诺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里，科学揭示了关于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科学和科学家在大学里应该有更高的地位。

后来的局面发展像斯诺所愿望的那样，应该说，超出了他的愿望。今天的局面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电子学、生物学、理论物理学，这些学科在大学里是最重要的学科，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人文知识分子反过来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现代文学的，人们心想，瞎混混的，没什么真才实学。

幸亏科学家们都忙着做实验呢，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的还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还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强调科学技术统治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对科学的真理霸权也提出质疑。科学自称提供客观知识，但他们指出，科学实际上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是受社会影响的，“物理学和化学、数学和逻辑烙有它们的特定文化创造者的印记，殊不亚于人类学和历史学”。

再进一步，似乎也可以说，科学是科学家们建构起来的。于是就有了建构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

所谓建构主义，属于解构主义的大思潮，虽然两个名称在字面上相反。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

在欧美，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数是比较左倾的，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把科学霸权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强建构主义或曰强纲领的建构主义（SSK）主张，科学并不是什么客观知识，而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谈判的结果；科学理论是一种社会构造，其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事实性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仅仅充当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学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另一个神话故事；拉图尔明称“要消除科学和小说之间的区分”。法伊尔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和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转变”是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但建构主义要走得更远。

在很多人文学科，特别在知识社会学领域、文化研究及科学学领域，建构主义势力强大。这种局面惹恼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索卡尔。他认为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攻击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不懂科学却经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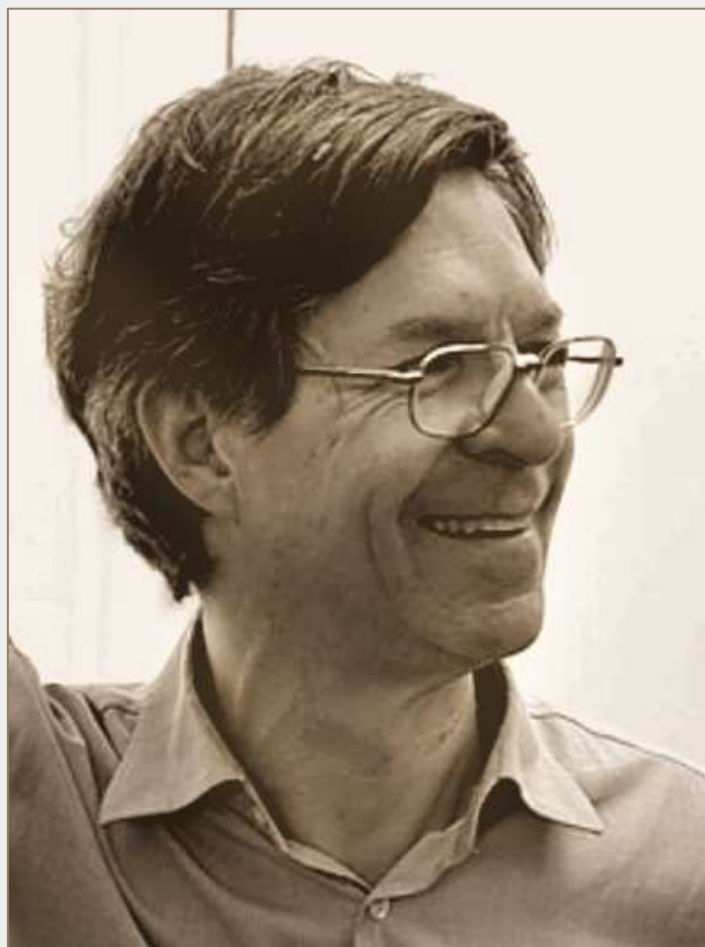
索卡尔本人是个科学家，同时是个左派，这尤其令他对建构主义恼火，他认为左翼知识分子不应当用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位索卡尔于是写了一篇“诈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他介绍了不少现代科学的成果和结论，然后把这些科学结论驴唇不对马嘴地用来支持一些左派主张，例如把数学里的选择公理（Axiom of choice）和妇女堕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这篇长文总的意思是说，最新科学成果表明左翼知识分子的主张是对的。

他把这篇长文寄给一家最权威的“后现代”杂志，《社会文本》。《社会文本》很有名，但从来没有著名科学家写来文章。不久，这篇文章登了出来，登在《社会文本》题为《科学大战》的一个专刊上。

然而一个月后，索卡尔就在另外一个杂志上发了另一篇文章，说明他在《社会文本》发表的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这个题目就够荒谬了。

好几个月里，美国、法国等地的建构主义知识分子目瞪口呆。他们上了索卡尔的套。怎么办呢？似乎只能反击说你索卡尔这样做是不对的，不严肃，缺德。后来，一边有罗蒂、德里达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来批评索卡尔，另一边有很多著名科学家起来支持索卡尔，包括领军物理学家温伯格，鏖战不休。索

卡尔事件发生在 1996 年，十年过去了，很多杂志上还在争论这些事情。



数学家、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 [Alan David Sokal]
伦敦大学学院数学教授，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

德里达批评“可怜的索卡尔”，说他使得“进行一次严肃反思的机会被浪费了”。这个批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我看来，倒是建构主义者在回应索卡尔的时候曲为自辩，不肯检讨自己这边出了什么毛病，结果浪费了一次严肃反思的机会。本书的论述范围和知识社会学极少重叠，这里简单谈一点儿我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看法。

在我看来，尽管建构主义的很多主张在流俗议论界风行，但颇少学理上的力量，最多是体现了自然态度和人文态度对科学主义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个人文学者，呼吁人文精神，反对科学对真理的霸权，义不容辞，非常愉快。但是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需要比呼吁人文精神这种愉快活动远更艰巨的思考。

强纲领主张，科学并不是客观真理，科学的身份和希腊神话、《圣经》、阴阳五行、几内亚的传说的身份相仿，仿佛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逃脱科学主义的罗网了。但在我看来，这样迎战科学主义未免轻率，几乎可说放弃了思想者应有的智性责任，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的本质，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对科学主义的迎战。

科学主义提出的挑战要严厉得多。把问题轻描淡写一番无法让我们当真摆脱困境，甚至还可能使

我们更容易陷入科学主义的罗网，建构主义者时常引用科学成果来论证其社会主张就是一例。

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

然而量子活动的概率性质对自由意志并未投以青眼，我们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识之士指明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个人的道德责任，然而，无缘无故的随机事件也并不增加道德责任的分量。科学成果能不能用来论证人生—社会主张？何处寻找论证的途径？这恰恰也是索卡尔的诈文本应引我们从学理上深思的问题。

科学认知对我们的道德诉求和艺术理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我们无法因此拒绝科学。科学提供了从大爆炸开始一直到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幅严整画面，这样一个画面是神话、常识、传统哲学完全无法提供的，与各种伪科学理论也完全不同。科学不仅提供对世界的系统的理性的解释，而且它通过对事件的预言以及技术性生产证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学技术的破坏力量，很多也是我们通过科学才知道的，臭氧层出现空洞即其中一例。

亚历克斯·罗森堡评论说，按照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若要理解达尔文进化论何以逐渐成为生物学的主导理论，仿佛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理解化石记录，更不需要去理解变异—环境过滤的来源，仿佛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了解十九世纪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看它们会允许哪些理论出现。

应当提到，罗森堡在这里表达的更多是一种理解而非指责，他回护说：“科学客观性的反对者并不在意说服别人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的辩证立场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他们的目标是保护智力生活的领地不落入自然科学的霸权。”

的确，如果我们只把某些建构主义者的极端论断挑出来读，那真是一派荒唐。其实他们在科学学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科学史案例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建构主义的“纲领”是领错了方向。

总的说来，科学显然不是和神话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按照我们今天对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学主义对真理的理解，科学是真理而神话不是真理。有《圣经》研究者据《圣经》文本推算，世界是在公元前 4004 年创造出来的。现在我们都认为这是错的。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大约是 45 亿年到 46 亿年。

两个科学家对地球的准确年龄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个争论很明显不同于关于《圣经》的争论，如果出错，错法与《圣经》的错法也不一样。科学体系有办法改变自己，提供更正确的结论，而对于《圣经》来说，不存在更正确的东西。若说科学是另外一种神话，那它和本来意义上的神话大不一样，不一样到了把它叫作神话对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毫无补益，只会造成混乱。

也许，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片面的，我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这样的句式属于官老爷的总结报告，严禁出现在哲学写作中。我还没学会怎样写哲学，但我相信已经学会了不怎样写。

避开“科学主义”和“构建主义”两个极端，如何把握“科学”和“真理”之间的关系？答案可以从本书找到。 ䷔

[【返回目录】](#)

石剑峰：加缪：文艺的反抗

[石剑峰 专栏作家。本文首发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东方早报]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1913.11.7—1960.1.4]

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蒙多维城，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
195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60 年 1 月 4 日，阿尔贝·加缪乘坐的小汽车撞上了路边大树，加缪当场死亡。听到儿子车祸去世的消息，加缪的母亲卡特琳娜叹息道：“太年轻了！”如果今天他还活着，将正好 100 岁。

从某种角度讲，加缪是另一个乔治·奥威尔。他们俩死的时候都只有 47 岁，都在寒冷的 1 月离世，都有肺结核，都信仰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都站在左翼的立场批判极权主义。比如奥威尔，他一方面坚定信仰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来自由，但同时又意识到社会主义也有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倾向。他认为，只有批判极权主义，才能发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公正和自由。而加缪始终有一个美好社会的梦想，在那里，不公正与不义将被自由所替代。

《加缪传》的作者托德说，“他们出身不同的社会阶层，却都信赖贫穷的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纯真本性。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对偏左但决非正统的立场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欣然接受。他们顶着时代的谄媚之风，揭露了左或者右的集中营或警察社会的残忍，也指出有些共产党人是如何通过重写历史去阐释事实的。”

以作家之笔进行文艺反抗

当英国作家奥威尔的那些杂文和《一九八四》出版的时候，奥威尔的左翼朋友们感到愤慨，右派和处于冷战时期的英美政府则报以热烈欢迎。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身上。1951年，他的《反抗者》出版之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都反对这本“反动的小册子”，而右派人士都发出欢呼，他们感到一位左翼知识领袖“转向”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则像那几年对待奥威尔一样，赞扬加缪的勇气和洞见，这部《反抗者》也因为冷战和反共浪潮而走红。尤其是在1950年代之后，东欧连续遭遇苏联的入侵，反抗苏联的《反抗者》更成为一个时代的读本。

什么是反抗者？“他首先是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尽管他有所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对于加缪或者奥威尔来说，有太多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近视、盲从以及对权势的嗜欲，这些知识分子比无知的帮闲群众更能充当极权主义的帮凶。

在《反抗者》出版后，加缪的朋友跟他有这样一段对话：

“您会给自己招来很多敌人。”

“大概会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加缪的好友、战友，法国哲学家萨特最初不方便评论这本令他厌恶的书，出于保护友情或者其他，萨特让自己的追随者让松执笔。让松在《反抗者》的书评中毫不掩饰自己厌恶加缪的反革命，在他看来，革命通常是一个民族的惟一希望。

但加缪这本书并非是反对革命，他指的是和他同样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反对那些使谋杀正当化的人。加缪有意识地在当代政治斗争中选择了异端立场。加缪的洞见比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要早四年，比法国作家法兰可斯雷蒙的《极权的诱惑》早25年。尽管如此，右派的阿隆并没有拥抱加缪。战后，世界各处都有许多批评家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及其带来的结果，奥威尔、卡尔·波普尔和加缪的思想是最为重要的，但加缪是那个时代的法国作家中，唯一一个表达如此鲜明立场的左翼人士。

《反抗者》在它那个年代，对整体偏左、亲苏的法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诘问，作为左翼知识分子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革命所带来的普遍暴力，如何面对已经在西方流传开来的古拉格和大清洗传闻。加缪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某些人是如何出于反抗的名义，接受了集体性屠杀的？某些党员（恰恰也就是反抗者），一旦转变为职业革命者之后，是如何在20世纪创建了极权国家的？”（托德《加缪传》）加缪要批评的就是受极端思潮吸引的知识分子，比如萨特。所以1950年代初两人从好友走向决裂，成了法国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如果加缪还能活得更久一点，在1960年之后，他是否会跟萨特重修于好，并肩走在五月风暴的街头？

加缪坚持认为，暴力是不正当的，反对将政治暴力正当化，在政治中要为道德保留位置，在任何运动中，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是必需的。所以在《加缪传》的作者托德看来，在《反抗者》里，加

缪想要独自一人反抗他在法国所处的圈子，反抗他曾经属于其中一员的法国左翼知识界的那些陈词滥调，他的自我救赎体现为以作家之笔进行的艺术反抗。“写作，就是要以行动反抗历史，反抗这段体现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弗朗哥主义的历史，这些意识形态所要达到的目的都建立在越来越非理性的罪行之上。”托德说。

在某种程度上，加缪将革命与暴力画上了等号。托德说：“加缪谴责革命者无视一切永恒的价值，无视一切超越于阶级斗争和时代差异上的道德。”加缪认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普遍信奉的唯一价值观就是革命，用托德的话说，是打着责任的旗号，革命者们为自己谋得了所有权利。而加缪对苏联和法国的革命提出了质疑，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当时这是勇敢的行为。加缪始终是一位左翼作家，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即便萨特也从未加入法共。跟加缪一样最后离开法共的作家还有杜拉斯。加缪为反对暴力尤其是革命暴力而写作，而萨特认为，彬彬有礼的左派是不存在的。

加缪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因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时候，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它恐怖的一面。”“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它是服务于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如果革命没有为其目的服务，正如当前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么就应该承认并且说出来。”他还说，“我们不需要希望，我只需要真理。”在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眼中，是加缪挽救了陷入极权主义泥潭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声誉。

正义之前要保卫母亲

加缪的“转向”让他的左翼朋友们感到了一种背叛。然而，加缪仍然相信某种社会主义，某种近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或是英国工党模式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可能的。

“加缪反对将政治暴力正当化，萨特则反对系统化的暴力。”《加缪和萨特》的作者阿隆森这样评价加缪与萨特的差异。当《反抗者》即将出版时，萨特也转向成为革命者，推崇暴力，并认为暴力是战胜人类压迫的必由之路。萨特曾说：“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萨特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但加缪则告别了革命阶段：他是一个反抗者，完全抛弃了从雅各宾主义开始的各种主义。但两人在与对方的论争中又重塑了自己的思想。

加缪希望，在谴责暴力和那个时代左翼的问题之后，左翼才能真正重新联合起来。加缪预想的联合没有发生，相反，因为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让左翼事实上分裂了。但也因为在布达佩斯发生的一切，萨特宣布了对苏联的新看法，“怀着遗憾和决绝，我正在剪断和俄国作家圈朋友们的友谊纽带，他们没有谴责（或无法谴责）匈牙利屠杀。我再也不可能对苏联官僚统治集团露出笑脸。”萨特后来在《斯大林的幽灵》中说，共产主义是惟一有可能通往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它的目标只能通过彻底的诚实来实现。

但更诚实者是加缪，即便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陷入战火，他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分说：“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他的这份保卫母亲大于抽象意义上的正义、和

平的情感，令他站在法国和北非的立场上模棱两可。这个“黑脚”（北非欧洲人自称）一开始并没有像萨特和其他知识分子那样谴责暴力和殖民主义，而是寄希望于北非的百万欧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到了最后才希望法国政府宣布“殖民主义是时候结束”。加缪的这种矛盾就被批评者提出，加缪反对革命的暴力，却无视北非、中南半岛反抗殖民者的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而这就是萨特的洞见：世界许多核心组织机构是由暴力构成的。

加缪不要暴力革命，也不要《圣经》，他的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乌托邦。

（本文参考了阿隆森《加缪和萨特》、托德《加缪传》、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等）

[【返回目录】](#)

毕苑：不朽的库克——读《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毕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首发于炎黄春秋 2009 年第 09 期]

1649 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震撼人心的一刻揭开了人类近代历史的序幕。约翰·库克 (John Cooke)，审讯查理一世的特别法庭的副总检察长，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他的控诉词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他创造了历史却籍籍无名。

约翰·库克 (John Cooke) 出生于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贫穷家庭，父母都是农民，一生为生计劳碌奔波。库克作为“贫困生”在牛津完成了大学教育，读书期间勤俭节约、品行端正，后来进入律师公会学习法律。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攒钱“壮游”欧陆，眼界大开，信念日增；回来后在格雷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开始执业。库克的正直品格和清教徒的坚贞信念日益显露，经常表达对社会改革和法律改革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道德上正确，政治上却不正确”，他的性格预示了他的职业生涯必然充满坎坷。



约翰·库克 [John Cooke 1608.6.5—1660.10.16]

英国副检察长，领导了对英王查理一世的起诉

作为一名律师，库克的正直在同行中早有口碑。他相信法律职业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律师实践给他增添了勇气，他决定揭露和批评他所处时代司法体制的不公正。他的清白廉洁使他得到“白色库克” (white Cooke) 的绰号。律师职业不仅训练了他的正直勇敢和社会责任感，更加深了他对于英国政治的深刻认识。1637 年的船舶税事件是一个重要标志。查理一世为聚敛财富、应付庞大的王室开销，下令增收本应经过议会讨论的赋税——船舶税。懦弱的议员和法官们向国王低头了，最终国王高于

法律。但是库克运用职业知识，看穿了船舶税案的漏洞：“如果国王可以在必要时采取任意措施，并且必要与否又由他自己裁定，英国的形势只会越发严峻”，他说，英国不应该像一块草坪，“国王想割就割”。（注：见《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P45，下同。）在随后更有历史意义的斯特拉福德案件中，开始刺激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他想不到，这个罪名此后成为他最熟悉的话题，并且把它送给了国王查理一世。

1640年，失去了理智的查理大军横扫苏格兰，这场闹剧加剧了斯图亚特王朝覆灭的命运。查理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命于君王，成为战争的领头人。但不幸的是王军一战即溃，形势极为不利。查理一世为了弥补枯竭的财源，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这就是“长期议会”（the Long Parliament）。但议会已经成为反对国王的革命力量，它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关进伦敦塔。这个案件作为英国革命的开端被载入史册。

按照1351年的《叛国法案》规定，“叛国罪”是指“预言或希望国王死亡，发动战争对抗国王或投靠国王的敌人。”（P49）大部分议员认为，是斯特拉福德“使国王误入歧途”，他应该承受叛国罪的罪名。但是库克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冒着被归为斯特拉福德一派从而可能葬送职业前途的风险，坚持认为斯特拉福德不是战争的最后责任人。不过库克的辩护终究是杯水车薪。虽然查理对这位忠实的执行者表示了同情，但他还是向议会妥协，斯特拉福德因叛国罪被斩首。库克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接手了这桩重案，开始认识到：种种情况的错误应该直接归咎于国王，独裁残暴的管理和征讨罪名不应该由它的执行者来承担。

如果说这个时候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还没有成熟，那么1645年6月的纳斯比一役，查理一世在和克伦威尔新模范军交手的表现，就让库克彻底明白了。在这场经典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大胜，王军伤亡惨重。重要的是，保皇党藏有国王的来往书信被截获，信中证明，国王一直希望把爱尔兰反叛者的军队引入英格兰来帮助他，并与王后密约以法国资金和军队作为回报。这件事使国王彻底丧失了民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叛国罪，它使库克产生了一个无人敢想的提问：如果任何人都是如此，为什么国王就不能？

对“叛国罪”的疑问提升了库克对于君主制的思考。

英国革命的结果无需多说，查理一世面临着革命力量的裁判。但这个审判毫无先例可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审判的合法性何在，审判权力从何而来？因为无论按照什么条例，没有一个法院可以对君主施行审判。就像查理一世后来在法庭上始终带有挑衅的提问：“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权力把我带到这里？”君主的权力高于一切，这是君主制度赋予查理的傲慢。如何在法理上找到坚实的基点，以合法和合乎正义的程序，给这桩历史性案件一个合适的裁决，时代把库克和他的同道推到了前台。

如果从11世纪威廉征服算起，到库克的年代，封建君主制在英国已经存在了600年之久。如此

漫长的社会结构足以使君主世袭制度作为一种观念深深融入社会意识中。库克首先批驳君权神授的“天然”观念。他认为君主世袭制是上帝命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君权并非神授。他从《圣经·撒母耳记》中寻找支持，证明君主制是人类违背上帝意愿的恶行，从而使审判国王有了道德上的支撑力量；接着他又论证国王在统治中的种种罪行。而议会这时也通过宣告：“上帝之下的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英国议会的下议院，是人民所选出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无需获得国王或贵族院（上议院）的同意或协助”。这个革命性的宣言陡然把人类历史推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关明确提出民主的原则”。（P1 43）很快下议院通过法案，在事实上和理论上赋予审判以合法性。

1649年1月10日，特别法庭通过了对于库克担任副总检察长的任命。面对紧张而危险的局势，库克没有丝毫犹豫，欣然接受了“如同从天而降的呼召一般”的任命。（P1 47）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和对英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深切体验，还有战争对英国带来的伤害，库克坚信，一个导致千万英国人民死亡的战争政策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公益，国王是导致这个国家无数自由人民被杀害的罪魁祸首。

审判在庄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1月20日第一次开庭。大法官庄严宣布：“带人犯上庭。”这个宣告也是史无前例的。憔悴的查理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副总检察长库克出场了，他掷地有声地宣告：

“我代表英国人民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P1 58）

经过多次开庭和证据阶段，法庭各位委员和顾问们厘清了案件事实。库克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对于英国人民来说，长远之计就是再也不要让英国为国王所累。国王对于人民的蔑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结论：君主制必须和国王一起灭亡。（P1 77）

我们来看库克这篇历史性的控词：

“现任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阴谋破坏这个民族古老的基本法和自由，取而代之以独裁专制政府。他用武器弹药，在这块土地上对议会和整个王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遍地荒芜、国库耗尽、贸易萧条、成千上万人民死于非命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恶果——所有这些严重叛国罪行，足以将查理·斯图亚特定罪.....”（P1 42）

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P1 51）

库克这篇伟大的控词结束了国家元首不受审判的传统，君主豁免权从此不再存在。

大法官布拉德肖则以契约思想论证国王的失职和罪行。他说，“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P1 88）这个“契约”思想，可比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哲学家要早几十年！最后大法官正气凛然地宣判：“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

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P1 89）

审判结束了。



查理一世被斩首

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前宽阔的街道上，在大好的日光下，行刑者砍下了查理一世的头。

处决国王后库克面临的战斗仍然严峻。法律容易更改，不容易更改的是人心。深入社会血液中的对君主制度的习惯成见，往往是革命之后产生复辟的一个原因。悲剧最终发生。

查理一世处死后10年，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库克和克伦威尔、大法官布拉德肖成为查理二世排除在特赦之外的三个人。但是克伦威尔和布拉德肖已经去世，历史的重压将由库克独自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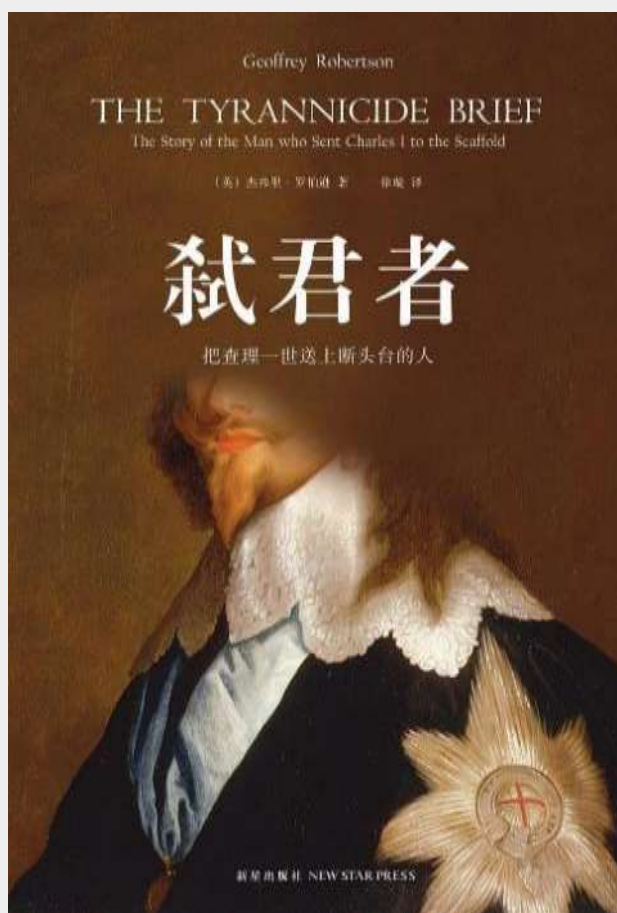
库克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但他没有像有些议员那样忏悔，而是坚决拒绝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他没有财产、没有“关系”帮他赎罪，有的只是对于法律和上帝的信念。他无所畏惧、充满自豪又不无遗憾地说：

“我们反对特权，追求普世的权利，我们为公共利益而斗争，要不是这个国家更热衷于奴役而非自由，我们本已建立起全民选举制度来保障所有劳苦大众的福祉。”（P296）

库克对自己还是小婴儿的女儿，怀着绵绵亲情和深深歉疚，写下感人肺腑的短信。因为他知道，作为“弑君者的女儿”，她将背负父亲沉重的罪名。

他还写下了宽恕，包括判他有罪的陪审团和法庭，包括出卖他的同胞。痛人心扉的话语打动了许多人。不过他一再表明，他的良心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遗憾。他就像一艘航船，在漫漫长途后驶进生命的港湾——“我将不再重回世上。”（P344）

相比查理一世的审判，库克的审讯要潦草的多；相比处决查理一世的庄严肃穆，库克的行刑则是残酷的多。死刑令写得明白：“你们将被倒拖着赴死刑地处以绞刑，在还未咽气时砍下头，割掉器官，取出内脏，如果还未死亡，将忍受烈焰的灼烤，并砍下头颅、五马分尸，你们的残肢将任凭国王处置”（P333）。



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英〕杰弗里·罗伯逊 著， 徐璇 译，新星出版社 2009 年 4 月出版

库克作为人类进步的代价惨遭杀害。但他为英国社会留下了很多开创性的宝贵思想。他在一本引人瞩目的著作《为法律教授和法律职业的辩护》中，敦促议会履行《大宪章》的承诺，加快司法改革。他推崇正义，认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法律是公正的保护者，理性是法律的根基。在复辟阴影严重威胁着共和国的暗淡日子里，库克还起草过一份告公民书，其中的一系列法案试图用一套宪法来保证法庭能够取消恶法。他明白宣布：只有通过合法审判，才能拘捕自由公民，否则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它的精神和 1689 年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相通，后者堪称美国宪法的前身，

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克还提出律师不得选择自己的辩护对象，即著名的“计程车规则”。

“弑君者”约翰·库克在当时是一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名声远扬的勇敢律师，为他描容绘形的人——本书的作者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 Robertson）同样不是法学界的无名之辈。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人权律师，他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参与过起诉皮诺切特（Pinochet）等的案件，也参与过对审判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法官的培训，他的著作在法学界影响巨大。

为什么把库克在历史的海洋中钩沉出来？这建立在作为库克的同行，作者对人类法制和文明发展历程有深切认识的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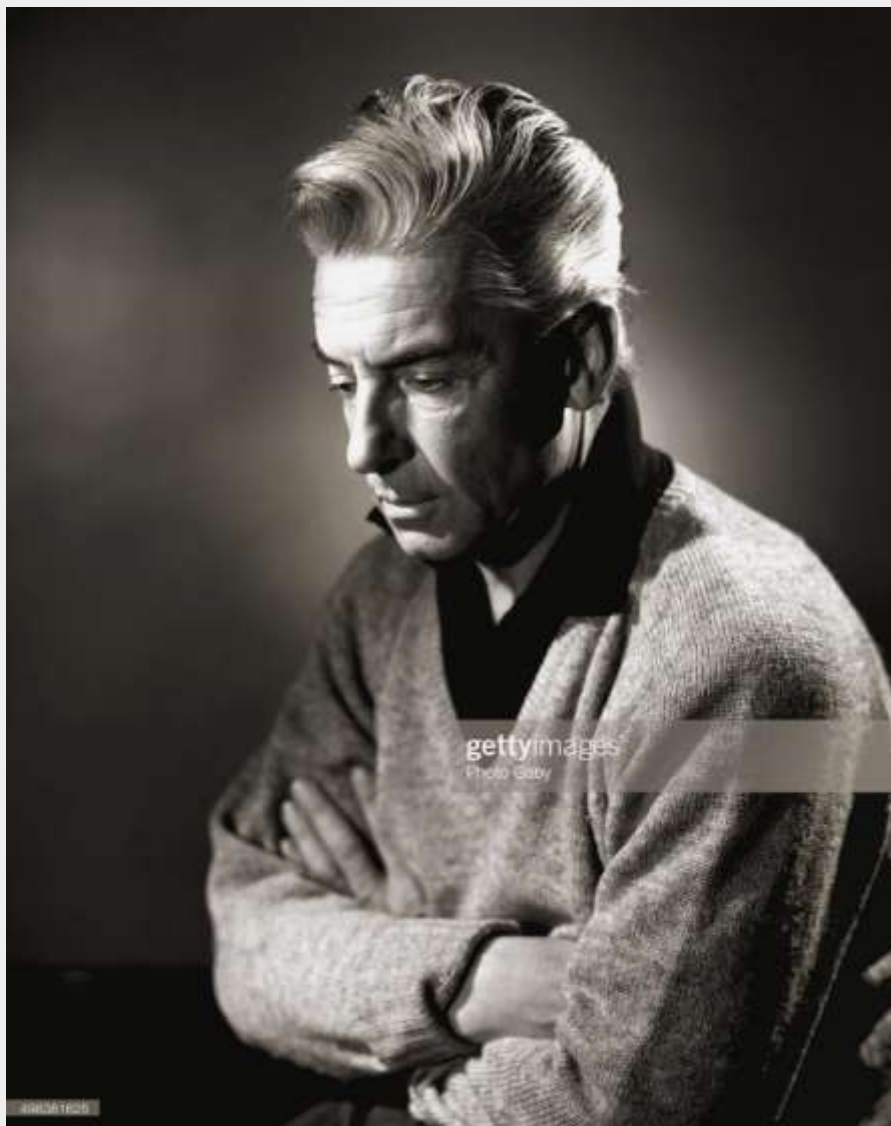
库克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英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作者认为，英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革命者通过法律——《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普通法，来证明革命的正当性。（P91）库克一生都是希望通过立法制度，获得大众的支持。他用事实论证了：统治者因犯谋杀罪或实施暴政而接受审判，是合法的。作者指出库克那个时代的价值：1641年至1660年，是一个律师的时代。律师们提出了许多到今天依然宝贵的社会理想：议会自主、司法独立、反对随意逮捕拘留、有权保持沉默、宗教宽容等等——一句话，反对任何暴政。

作者多次强调，很多历史教科书都没能让人领会到1649年取得的成就，有些读物只是一味夸张、渲染处决查理一世的场景，而库克总是落在克伦威尔的影子里。作者要人们（下转87页）认识到，库克对于法律改革、公共医疗、行政管理的建议在今天都得到了实施和承认，他的不朽意义在于——用正义的法律程序实现了对最高权力者的审判。相比后世多位暴君的历史结局：纽伦堡国际法庭对于纳粹高层分子的审判，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萨达姆接受的审判等，无疑更加显示出库克起诉国王案的不朽意义。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题目中加引号的“弑君者”是该著中文版的译名，我想译者应该也同意，英文原著的真实含义为——诛杀暴君的人。 ■

[【返回目录】](#)

浮生旧梦：著名音乐家卡拉扬纳粹党员的终生污点

[本文转载自 2017-7-11 中国在线，原题：著名音乐家卡拉扬为什么要加入纳粹党为希特勒服务？]



赫伯特·冯·卡拉扬 [Herbert von Karajan 1908.4.5—1989.7.16]

享有盛誉的著名奥地利指挥家、钢琴演奏家、舞台剧导演

卡拉扬的人生之所以传奇，一方面源于他在音乐指挥方面的过人天赋和杰出贡献，一方面源于人们关于他是否是纳粹战犯的争论。那他到底是不是纳粹战犯呢？

1989年7月16日，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家卡拉扬病逝，终年81岁。他终究没能活到1991年，以便参加他的同乡——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大师莫扎特逝世200周年的庆祝活动。卡拉扬逝世后，世界乐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领域都陷入了悲痛之中，并举办了相当隆重的纪念活动。

卡拉扬的传奇人生不仅是因为他神乎其神的音乐指挥，还因为他在二战时的纳粹党员身份。许多

人认为，正是因为卡拉扬有着超乎寻常的音乐贡献，才使得他最终逃脱了被视为纳粹战犯的审判。



卡拉扬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向观众致谢，但同时，场外是抗议纳粹党徒卡拉扬的示威阵容





1939 年 3 月，**希特勒**在德国贝希特斯加登他的家中举办“慈善”音乐会。

卡拉扬因与纳粹合作，于战后持续两年半的时间，被“强制”失业

赫伯特·冯·卡拉扬于 1908 年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自童年时起卡拉扬就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音乐天赋，他 5 岁时便公开演奏，俨然是一位钢琴家。他的父亲是医生兼业余音乐家，如同莫扎特父亲一样，渴望儿子早日成名，极力鼓励儿子从事音乐。然而，卡拉扬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 岁时，卡拉扬在拿破仑曾涉足过的小城——乌尔姆开始了自己的指挥生涯。然而，5 年后，他被解职，一无所有，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的“发现自己眼前没有任何合同，也没有地方过夜，饿着肚子，剩下的只有在乌尔姆市演出时的美好回忆”。但回忆不能填饱肚子，他走遍全国谋生，但连试用的机会也没有了。

于是，卡拉扬去了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像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无名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卡拉扬排练了《菲德里奥》，9 月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就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制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1935 年初，27 岁的卡拉扬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

而拉贝在离开亚琛音乐总监职位后，被任命为第三帝国文化局音乐处处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兼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不久戈培尔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于是，作为亚琛音乐总监的卡拉扬成为了纳粹的拉拢对象。据卡拉扬讲，正是那时他受到了参加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

监的合同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卡拉扬为了保住在亚琛的这份工作，不再重演失业的悲惨遭遇，他不得不向纳粹低头，加入了纳粹党。



1981 年卡拉扬赴日本东京巡演，与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合影

也正因为卡拉扬这段纳粹党员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人要求将卡拉扬列入纳粹战犯受审。在二战结束后，著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的组织官员们呼吁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托斯卡尼尼参加这一重大节日，但托斯卡尼尼的回答是：“我不去，我决不与为希特勒服务过的孚尔特温格勒、卡拉扬之流混在一起！”可见那时把卡拉扬定为纳粹战犯的观点是有一定市场的。卡拉扬也确实因为有加入纳粹党的污点而成了首批被带到临时法庭而准备接受审判的犯人。

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卡拉扬不是纳粹战犯，他只不过是政治牢笼中的一只囚鸟而已，并非出自自己的意愿加入纳粹党。当时在纳粹强权及狂热的沙文主义气氛下，如果对抗这一强权便如同以卵击石，卡拉扬在那里服务也是自然的选择。即便他有为取得各种职位的私心和机会主义式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争执的关键点在于卡拉扬加入纳粹党的日期上，这决定了卡拉扬入党的主观倾向：到底是自愿加入纳粹还是被迫加入纳粹？卡拉扬自称他是 1934 年迫于纳粹压力入党的，而保罗·莫尔在 1957 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投机者》中写道：“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 1934 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

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 1-607525”。



卡拉扬在演出现场，和指导排练



卡拉扬和妻子

最终，政府考虑到卡拉扬在音乐上的杰出贡献而对其纳粹历史不予追究。卡拉扬也得以在后来的

人生中继续他辉煌的音乐指挥生涯。到 1988 年 4 月 5 日，当他在全世界文艺界的祝寿中度过 80 岁的生日时，他已被全世界舆论界赞誉为“20 世纪的奇迹”、“艺术界的巨头”，以及“指挥界的帝王”。

无论如何，卡拉扬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在二战期间，至少人们能从卡拉扬的音乐中听到一丝精神安慰，“音乐代表着他们唯一保留着的被撕成碎片的尊严”。在他辉煌的音乐贡献面前，至于卡拉扬是否是纳粹战犯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6 年 11 月，「如何依宪规范执法问题」研讨会，围绕基层警察违法滥用暴力、粗暴执法的事件展开讨论。参会专家包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李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宋立律师，天则所法治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蒋豪主任，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先生等。
- 2017 年 12 月，「美国减税与国家竞争」学术沙龙，解读美国减税举措的影响，分析我国财税制度改革方向。参会学者包括：著名财税专家、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经济学家秦思道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教授等。
- 2018 年 4 月，「税负与产权」云豹沙龙，聚焦税负与政府职能的关系，阐明私人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参会学者包括：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独立学者子衿，大成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陈永杰，经济学家秦思道，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等。
- 2018 年 5 月，「表达自由与程序正义」云豹沙龙，解读鸿茅药酒案，关注表达自由的司法保护与实践。参会学者包括：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经济学家秦思道，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等。
- 2018 年 7 月，「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讨论人工智能的技术利弊与伦理冲突。参会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何光沪，政治学家王焱，经济学学者宁越，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等。

二. 众筹方案

2019-2020 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3 万元（2019-2020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 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 (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 (每期沙龙仅一位): 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 (全年仅一位): 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 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 861581962310001 (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 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 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 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HJCD1vHbBqVKjEEIDbA0g> 提取码: 7pxt